熊伯涛：背着错误处分走完长征路

“父亲革命理想坚定，哪怕背着错误处分，仍无怨无悔去长征，经历了不一般的考验。”2026年7月上旬，记者前往北京，见到了开国少将熊伯涛的长子熊戈锐、次子熊湘江。提起父亲的长征路，两位老人眼里泛起光亮，那些刻在父辈讲述里的行军记忆，顺着岁月的脉络浮现出来。

熊伯涛，1904年12月出生在武汉市黄陂区黄严湾村一个贫苦农家，1926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。



熊伯涛将军（前排左）、夫人李文（前排右）和子女们合影。

参与策动宁都起义

8月下旬，记者来到黄严湾村。熊伯涛的侄子、72岁的熊焱国指着一片地说，爷爷奶奶和伯父过去就住在这个位置，后来发大水房子都没了。

村头荷塘边竖立着一块刻有熊伯涛生平简介的石碑，这是当地政府为了纪念这位从黄陂走出去的开国将军专门立下的。如今，这里已经成为村里后辈接受红色教育之处。

“他曾经上过冯玉祥部开办的第二集团军军官学校，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。”82岁的熊戈锐介绍，父亲曾在黄陂老家上过私塾，后来又上了初小、高小。在校期间，他看不惯地主子弟仗势欺负贫家同学，多次挺身而出打抱不平，结果两次被学校开除。

77岁的熊湘江补充说，父亲虽然被学校开除，但从来没有后悔过，反而更看清了旧世道的不公，心里埋下了要改变这个黑暗社会的种子。“1926年，父亲在黄陂老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负责农民协会工作。”

1927年，熊伯涛得知一位同学在冯玉祥开办的第二集团军军官学校当副校长，就来到郑州，进入该校当学兵，不久后升任班长。中原大战中冯玉祥部队战败，熊伯涛所在部队被改编为国民党军第26路军。

“这支在军阀混战中被打残了的部队，被调到江西‘剿共’前线充当炮灰，但在红军面前更是不堪一击。兵无斗志，甚至看到老百姓捕鱼的松光——老百姓点燃有油脂的松树皮用来照明，他们也以为是红军来了。”熊戈锐转述父亲生前的回忆：到了被红军包围的宁都后，整个26路军进退维谷。

按照地下党组织的安排，熊伯涛和26路军中的其他共产党员暗中发展士兵党员，宣传革命，介绍苏区和红军的真实情况。

“投降红军吧！”许多士兵动了这个念头。党组织开展地下活动更加活跃，一批军官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

1931年12月14日晚，在中央指示下，党组织发动了国民党军第26路军宁都起义。起义部队后来被整编为红五军团。1933年，熊伯涛被调入红一军团。红一军团主力回师福建在沙田编队，他先后担任多个师参谋长。这一时期的五都、枫山铺、东黄陂等战斗，熊伯涛都参加了。

1934年，熊伯涛担任红一军团2师参谋长，投身第五次反“围剿”，战斗极为激烈。其间，熊伯涛在攻打敌李玉堂师战斗中负伤，不得不就医休养20余天。

熊湘江说，1934年5月，因“左”倾错误路线，父亲被错误开除党籍，调任红一军团教导营教员。

熊伯涛在自传中描述这段经历：在打草台岗消灭敌萧乾71师的行军中，因自己谈及了冯玉祥，被错误认定为政治动摇，就被开除了党籍。

“我内心极为沉痛，情绪受到了一些影响。自己是共产党员，没有任何反革命的思想和行动，对我的怀疑总有一天会弄清的。我坚持革命到底的决心始终没有动摇。这个决心鼓励着自己走过了长征的征途。”

1934年10月，熊伯涛随中央红军开始长征。1935年9月，红军到达甘南哈达铺地区，熊伯涛恢复党籍，担任陕甘支队1纵队4大队作战参谋，参加了莲湾、吴起镇等战斗。陕甘支队到达陕北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，他调任2师作战科科长，参加了直罗镇战斗和东征、西征的曲子镇、七营川、山城堡、定边等战斗。红一方面军西征前，他被任命为2师参谋长。

新中国成立初期，一位老领导派人给熊伯涛送来两瓶茅台酒。对熊伯涛被错误开除党籍，老领导后来一直心怀歉意。

“父亲什么都没说，把酒收下了。”熊湘江回忆，母亲生前曾提过这段往事，“母亲说，他们两人对此心照不宣，她心里却是满满的感动。”

赤水河边缴获茅台酒给脚消炎

1935年3月16日，中央红军为调动和迷惑敌人，决定三渡赤水，向川南进发。

鲁班场战斗中与敌军交手后，熊伯涛所在的红一军团教导营奉命撤向其他地区与敌周旋。这时，教导营接到命令，要在赤水河上架浮桥。

“一天黄昏，军团来了一封信。”熊戈锐说，父亲曾在回忆录中详细记录了这件事。那封信上有3个“十”字和3个“圈”，要求教导营立即出发，第二天拂晓前占领茅台村，还要迅速找船只和架桥材料，在中央军委工兵营抵达后协助其一起架桥。

谁知，那晚突然下起大雨，同志们在看不见人的雨夜泥泞中前行。“糟糕！跌倒了！哎哟！”“同志！不要紧，明天拿前面的茅台酒来滋补一下！”熊伯涛生前回忆，同志们一夜未眠，就这样互相安慰着，终于赶在黎明前抵达茅台镇附近。

“啪！啪！啪！”枪声响了。侦察连的战士报告，前方发现敌人的布哨。连长率后面两个排的主力沿河疾奔追击，追出10多里后，消灭大部分敌人，俘获数十人、数十条枪以及大量手榴弹，还缴获几十瓶茅台酒。

经宣传发动，当地很多群众主动献出了运送盐巴的船只。熊伯涛和其他教导营的同志在茅台镇一边搜查反动势力，一边搬运架桥材料。

这里原来有座铁索桥，红军赶来之前，敌军飞机把铁索桥炸掉了。后来，教导营、工兵营决定用运盐的船架浮桥。浮桥建好后，朱德总司令连连称赞。

“父亲曾回忆，因为连续行军，加上雨水较多，很多人的脚都烂了，不少人的脚还化脓。”熊湘江说。

那几日，教导营和工兵营的将士极为高兴，有酒给脚消炎，还能喝上茅台酒，一个个干劲十足。

红军四渡赤水发生在1935年1月29日至3月22日。其中，3月16日至17日为三渡赤水，3月21日至22日为四渡赤水，之后跳出了国民党军队的合围圈。四渡赤水，是中央红军长征中以少胜多、变被动为主动的关键之战。

开国上将陈士渠，时任红一军团教导营营长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他曾回忆这段经历：“有人提出用茅台酒消毒的办法，经询问卫生员说会起到作用，于是大家便开始操作。但毕竟茅台酒是名酒，不能浪费，于是众人便想了一个办法，用脸盆盛酒，大家轮流泡脚。尽管这会造成一些交叉感染，但也没有办法，因为条件有限，只能如此处理。”

爬雪山体力不支背不动半斤黄油

“那最后的半斤黄油，他实在背不动了，只好丢掉。”熊戈锐说，父亲曾写过一篇文章，讲述他长征时背着黄油爬雪山的故事。

红一军团教导营到达川西北藏民区后，经常走在军团直属队或者中央纵队的后面，粮食非常短缺，更谈不上副食，油盐几乎没有。他们在通过高山地区时，风雪交加，呼吸困难，四肢无力，行路艰难。尽管如此，战士们仍然互相帮助，互相鼓励，渡过了种种难关。

一天下午，熊伯涛和战友们来到了卓克基的一个寺庙。该寺受敌人指使与红军为敌，寺中人员战斗失败后逃跑，留下的财产被红军没收并分给了贫苦的藏民。

熊伯涛走到寺庙第二层经过一间大厅时，发现角落里有一个脏兮兮的簸箕，里面盛放着一堆黄油。

“这应该是部队没收寺院财产时，不知是有用之物，又见其脏而遗弃的。”和熊伯涛同行的战友提议，把黄油带回去。他们把黄油表面的尘土刮去，借了伙房的菜盆子熔炼，香气扑鼻，大家就拿着青稞面饼蘸着吃。

从卓克基出发，熊伯涛和教导营中的王教员轮流背黄油，一人背着走几里地后交给另一个人。当时，熊伯涛虽然还没有被恢复党籍，但王教员对熊伯涛很是照顾，他说：“你看你这么大的个子瘦得像个龙船架子，光背着你的包袱都够受，还是我背吧，我不累！”

第二天，他们行过马河坝村，周遭已然是连绵起伏的山区了，黄油还有一斤多。由于海拔很高，尽管没有很陡的山，粮食缺乏，战士们因体力极差，一个个呼吸急促，行路艰难。

一阵风雪过去，熊伯涛感觉两条腿好像绑了数十斤的重物一样，要费很大的力气才能拖着往前走，走一下就喘上一阵。一阵更大的风、更密的雪吹来，还带着小粒冰雹，打得人脸上发疼。

“老熊，你快走吧。我实在走不动了。这个菜盆是伙房的不能丢，黄油你要就带上，不要我就扔了。”王教员在风雪中坐下，用短大衣裹住头。熊伯涛见状，果断说：“黄油扔了，马上起来走！”

那些黄油，其实只剩半斤左右，却压得爬雪山的红军如千斤重负。

记者耿珊珊